

香港青年工作

楚島生 刘小钢 吴旭华 吴军捷

2.865.8
10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变迁中的香港青年	(1)
一、蜕变时代的青年一代.....	(1)
二、青年发展的文化氛围.....	(11)
三、青年的越轨犯罪问题.....	(26)
第二章 青年工作的理论与方法	(33)
一、青年服务的内涵.....	(33)
二、活动互激论与社会体系分析法.....	(37)
三、青年的社会参与训练.....	(44)
四、香港的青年政策.....	(55)
第三章 青年服务的工作机构	(64)
一、政府机构：青年服务的指导.....	(64)
二、志愿团体：青年服务的推行机构.....	(71)
三、香港社联：青年服务的协调职能.....	(86)
第四章 青年服务的工作模式	(93)
一、中心服务：青年工作的重要阵地.....	(93)
二、外展社工：离散青年的服务形式.....	(105)
三、学校社工：在校青年的服务形式.....	(112)
四、青年辅导：协助解决个人问题.....	(118)
第五章 青年服务的工作技巧	(124)
一、“五W—H”：工作程序设计.....	(124)
二、团体活动：小组工作技巧.....	(129)
三、活动式学习：教育技巧.....	(143)

四、助人自助：个人辅导技巧	(149)
第六章 青年工作者的角色和训练	(160)
一、角色：辅导者、支持者、组织者和教育者	(160)
二、体验：青年工作者的苦辣酸甜	(165)
三、素质：专业知识与能力的融合	(173)
四、训练：工作角色的强化	(177)
五、交流：青年工作者的新取向	(182)
第七章 青年服务的历史发展	(188)
一、形成期：战后至1966年	(188)
二、奠基期：1967年至1978年	(192)
三、发展期：1979年至1985年	(198)
四、挑战期：1986年至1988年	(202)
结 语 香港青年工作的评估与展望	(208)
一、对现行青年工作的简略评估	(208)
二、影响九十年代青年工作的三大因素	(211)
三、香港青年工作发展趋势的若干展望	(214)
附录 香港青年工作大事记	(219)
后记	(224)
主要参考书目	(225)

第一章 社会变迁中的香港青年

香港，自从1841年被英国占领之后，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已是亚洲的经济明星，又是一个国际性的现代大都会，一直奉行多元化开放的发展政策。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经常处在急剧的变化发展之中。急剧的社会变迁使香港年轻的一代面对着工业化、都市化、信息化与政治化的冲击和挑战，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面对着种种难题与困境，在其成长与发展环境中扮演着多元的角色。

一、蜕变时代的青年一代

近20年来，香港的经济、政治乃至整个社会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经济腾飞，使香港步入世界富裕社会的行列；政治冲击，使香港面临1997年的重大历史转变；人口激增，对香港各项社会设施的需求造成很大的压力；社会结构变化及功能分化，使香港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出现了新的起点；强迫教育的推行，既使香港人口素质发生着变化，又使青少年学生面对着各种压力；资讯的高科技传递，使香港市民进入信息化的时代；此外，还有眼花缭乱的传媒刺激、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的泛滥、狂热的消费浪潮……这一切表明，现今香港社会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蜕变时代。对香港的年青一代说来，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既为他们的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又使他们的成长面对着种种难题与困境。

经济腾飞中的青年职业劳动

香港从过去的一个“小渔村”发展到今天，已经从开埠初期的转口港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大都会和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现代化工商业港口城市之一。在过去的20年里，香港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从1966年至1986年止，香港生产总值的增长便超过了4倍，若以出口、入口和转口的总值计算，1987年的总值已从20年前的接近200亿港元增至7,700多亿港元。1988年，香港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491.7亿港元。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为香港青年的就业和劳动创造了良好的机会与条件，而青年劳动大军也为香港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香港，青年的就业是比较充分的。当西方国家普遍为失业问题感到困扰的情况下，香港至今保持着理论上与实际上的充分就业状态，其劳动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一般的发达国家，而失业率一直比较低，是世界上比较稳定的就业地区。仅1986年，香港就为560万人口提供了2,723,500个就业岗位。20岁至24岁男青年的就业率一直稳定在88%—90%左右，而女青年的就业率则从1961年的51.1%增至1986年的83.7%。

由于就业机会充分，青年的职业选择性强。从雇主方面看，大多数雇主要求受雇人士年轻，有中等文化程度和一定的专门技能，文职人员则要求有一定英语口语和文字能力。而就业机会易寻，使青年人求职除了从工资较高、福利较好、工作环境较佳以及晋升机会大等方面选择职业岗位外，重白领而轻蓝领的社会观念往往驱使青年人看重并追寻白领

工作，而蓝领工作却很少人问津。在职青年中，“转工”现象也很普遍。工作不顺心或因为工作沉闷枯燥、难与同事相处、同上司关系不佳、假期太短、工作时间长、厌恶工作环境等都会成为很多人重新谋求职业的原因。

香港经济的起飞，只是近30年的事情。它的飞速发展，除了得利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灵活的经济政策和有利的国际机遇等因素，更得力于居民的拼搏精神，同时也离不开香港青年一代的贡献。从香港劳动人口看，年龄结构比较年轻，青年劳动人口庞大。据1981年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从1971年的35岁下降到31岁；1986年中期的人口统计资料表明，年龄在25岁以下的劳动人口占当地劳动人口的23%以上；而1987年，15岁至29岁的青年劳动人口占劳动人口276万人的39.56%。

青年不仅在劳动大军中占了较大的比重，而且职业分布也很广，从事白领工作的青年日益增多。1986年，15岁至29岁的在职青年中，从事文职及有关工作的达25.2万人；从事专业、技术或行政经理级工作的达10.3万人；从事政府行政工作及驻外使节职业的有1.6万人；从事生产及有关工作、交通操作员及工人、或未能分类的有45.5万人；其它如服务行业、销售人员及农业、渔业等职业的青年则有26.7万人。

香港青年一般都是比较勤奋的。一方面，青年人显现出日渐强烈的个人成就取向，重拼搏、望晋升。香港是一个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个人成就的获取与职务的晋升主要依赖于个人的拼搏。如商界，一般商业机构把主要职务划分为经理级（包括高层和中层经理）、主任级和文员级三级，形成金字塔形的架构，除了需要特殊技能与训练者外，大部分主任

级工作都是由职员级晋升接替，而经理级的职位在机构内推举不出适当人选才向外招聘。故此，商业机构里的空缺填补，主要是横面进入（即向外招聘）和内部晋升两种途径。主任级空缺的填补，横与直的比例一般是20:80，而经理级的则为30:70，倘若青年人工作表现突出，求知欲强，有上进心，人际关系良好，肯不断磨练自己和突破自己，会有很多的晋升机会。

另一方面，金钱在香港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而挣钱也在香港人生活中有着特殊的价值。香港社会对钱的追求所给予的高度重视和价值评价，似乎是罕见的，而它所形成的文化氛围以及市民“搏命赚钱”的心态与行为，无疑对年青一代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香港社会的高消费以及市民对生活质素越来越高的追求，使许多年轻人在正职以外经常做超时工作或兼职，瑞士一家银行曾经对全球52个城市的就业情况调查资料显示，香港人工作的勤奋名列这些城市之首，其工作时间也比全球任何地方员工工作的时间都长。

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香港的职业架构日趋复杂，对就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使香港青年面临着劳动素质优化的严重挑战，不少在职青年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进修与职业培训。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香港当局与民间团体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973年成立了香港训练处，对在职人员培训提供帮助；1976年颁布了学徒制法案，规定对有关行业及职工实行学徒制；1977年设立了制衣和建筑两个培训中心，到1982年，香港当局设立了专门负责职业培训工作的职业训练局，并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发展工业教育和各种类型的技术教育，充实普通中学的各种实用及

工艺科目，加速建立与扩建工业中学、职业先修学校、工业学院及理工学院，以便青年人有更充分的获得较高学历与工业技术训练的机会。

现在，香港有 5 间官办工业学院、近 20 个工业训练委员会、7 个一般职业训练委员会和 10 个训练中心，并与各种专业学会及民间职工教育机构构成一个覆盖面广的培训网络，受训人数从 1977 年的 5,000 人发展到 60 万人，从而培养了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合格服务人员和适用型专业人才，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在职青年的技术素质。

富裕社会中青年成长困境

经济的迅速增长与政治的稳定，使香港很快步入富裕社会的行列，并成为—个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大城市相比美的大都会。在这繁华的大都会，到处是高耸云霄的楼宇、鳞次栉比的大厦，多采多姿、巍峨壮观，一片繁荣景象。市民的生活水准一直在稳定地提高。然而，富裕的社会环境虽然为青年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同时也带来了富裕社会的“社会病”，使青年的社会化面临着相当大的困扰。

香港家庭的经济状况是比较好的。一个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平均达到月薪 500 美元以上，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及管理人员工资约为产业工人的 5 至 9 倍。据 1986 年中期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全港家庭月收入的中位数约为 5,200 港元，家庭成员月总收入不足 2000 港元的家庭占全港家庭总数的 9.7%。最近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在每月开支中，低收入家庭伙食开支占 45%，中等家庭为 38.9%，高收入家庭仅为 30%，而其中外出用餐的分别占 20.9%、19.39% 和 16.7%，住房费用

则分别占月开支的15.3%、20.3%和25.8%。目前，香港的大部分家庭均有数量可观的家庭储蓄。

在消费热潮中，处在中下阶层的人士、甚至高薪酬的专业人士，即使因为楼价过高而没有能力购买标准较高的楼宇，但他们有能力以“的士”代步，购买现代化家庭的电器设备、装修住所，购买金银首饰与华衣美食，出外旅游观光。六十年代视为奢侈品或地位象征的空调机和电视机等高档消费品，早在七十年代中期已成为大多数人能力所及的用品了。如果说早期的香港只是强调拚命挣钱以求得生存和温饱，而今日的港人已转向拚命挣钱、尽量消费与享受这个新支点上了。

富裕社会的价值观念与社会风气，刺激着市民的需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上升而相应提高，消费能力成了成功与出人头地的标记，销售名牌的名店成了有高消费能力人士流连的地方；六十年代末期开始兴起的电视机与大传播媒介，把消费主义渗透到社会的每个家庭和各个角落；利润至上的商家不失时机地“创造”种种时尚、推出一个个的消费热潮，高明地引导消费，刺激着千万港人的神经；……于是，连没有高消费习惯或能力的人士，也可以有崇尚高消费的心态，而一般人也变得只顾眼前、注重物质和商业化。这种“都市文化”主要以财富拥有量衡量人的价值和成就，使物质财富奴役人心、塑造灵魂，同时也刺激着青年一代消费文化的发展。

在大都会生活方式与物质主义、消费至上、崇尚物质享受的风气影响下，香港青年的消费欲望也很高，即使处于中下阶层家庭的子女也有很高的消费能力。据一些学校社会工

作者的非正式估计，中下阶层家庭每月给其子女的零用钱一般都有二、三百港元，甚至四、五百港元。而香港经济的发展与劳动力的不足，也为青年兼职提供很多的机会，一般在快餐店、超级商场、补习中心或便利店打工，每小时收入亦可达15至20港元。在消费热潮中，许多青年认定不同的消费能力可以显示出不同的“个人品味”，而不同的“个人品味”则显示出不同的“个人形象”。尽管在日常的生活中，年青人都感到压力、不安与苦闷，而塑造一个成功、惹人羡慕的形象则可以补偿一切。于是，消费能力与消费水平几乎成为青年朋辈界定身份的标准，名牌与时髦成为许多青少年追求的目标和在朋辈中炫耀的方式，斗“威”比“款”、“领导新潮流”成了许多“新潮青年”与青年小群体的行为心态，而寻欢乐往往往充斥着许多青年的闲暇。1978年起在香港青年兴起的“油脂热潮”，就是这种心态与行为的生动写照。

“油脂次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力地揭示出，青年的消费行为，如同整个青年亚文化一样，可以说是年青人对自己所处的处境以及所遇到的问题的一种回应。诸如社会的富裕并没有为青年人带来社会地位的上升，经济的发展与就业的充分也未给青年个体的发展带来光明，以及对教育制度的失望等等。在社会没有能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与缺乏正确的引导等因素作用下，他们便在个人的空间、朋辈的圈子中寻求解决办法，而对青年人说来，消费不仅仅是可行的，而且是较为容易实现的，消费能力的提高与个人的“成功”或个人价值的实现是成正比例的，他们可以通过流行的心态、时尚、群体行为去肯定自己，在狂热的消费中实现被扭曲的“自我”。

富裕社会对青年的影响，并非仅仅表现在物质化、商业化上。处在青春期的青年一代，需要通过各种物质的、精神的交往活动，满足他们各种物质的、精神的需要，寻求身份的认同，建立与社会的各种联系。但是，急剧的社会变迁与大都会式的香港社会发展，却往往使青年面对着人际间疏离的难题。

在现代社会，社会变迁的加剧，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变，人际关系也在变，而且在变化的速度上，比传统社会快得多。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人口流动。近20年来，香港新城区建设发展很快，1986年，荃湾、沙田、屯门等8个新市镇的人口就比10年前激增近三倍。一个个新市镇出现在以往荒芜的土地上，人口也大量迁移到新城区居住。人口的大量迁移新城区，一方面打破了住户在原居住地多年来建立起的邻里关系以及青少年的朋辈关系，而新关系的建立尚需一个时期的努力；另一方面，高层建筑、独门独户又使邻里间沟通疏远，环境陌生。

在传统社会，人口的大量迁移是比较少的，由于长时间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环境，彼此间有较多共同的生活经验往来，人际沟通也比较畅顺，邻里与社区通常有比较清晰的道德与行为规范，为青年社会化提供了认同的方向。而现代社会则不同，新社区新邻里在短期内往往难以提供明确的道德与行为规范，同时人际间的沟通也产生着疏离与情感系统的弱化，使青年人得不到情感上的满足。

另一方面，香港社会的生活节奏较快，人们大多忙于工作而患“时间短缺症”，似乎无暇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形成人际关系的表面化，令人产生反正别人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感

觉，从而出现人际疏离的“无名社会”；同时，香港社会中以“互惠”为原则的人际交往，也显得人情味淡薄，造成人间情感交流的贫乏；并且，香港社会家庭的变化，也往往使家庭情感系统弱化，家庭沟通困难。

香港社会人际沟通的上述特点，使青年的社会化面对着人际情感疏离、身份认同模糊、行为规范不清等难题。早期的一项中学生调查也显示，他们最大的困惑就是“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包括着孤独感、自我疏离感、无规范感、无意义感和无能感等等。

富裕社会中的成长困境，同时也表现在香港青年社会化的各方面，正象一位香港学者所说的那样：“随着经济迅速成长，商品价值观的兴起，一套以利润、交换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便打破了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念。青少年在商品泛滥的情况下，便失去了对社会承担的使命感，改而以发展自我为中心，追求利益、刺激、享受来充塞自己精神范畴内的空虚。他们受着不同形态的问题所迷惑而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他们迷惑于三合会的英雄感，邪教的吸引力，扭曲的性关系，软性毒品所造成的片刻逃避及商店盗窃成功的满足感。他们的生命没有昨日，又没有明日而只有今日，对自己的存在产生模糊形象，产生精神及心理失调，且更与整个生活时空失调。他们对社会毫无归属感，对人生及社会缺乏目标与思想。”^①

“冷感社会”中的青年参与

在人们眼里，富裕的香港社会又是一个政治冷感的社会，两者之间的反差很大。在以往的年代里，香港人的政治

兴趣是十分淡漠的，绝大多数港人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与生活质素，至于国家、民族、公民意识与政治发展等问题，一直提不起多大的兴趣，人们之间大多避免谈论政治。

除了近年来较大声势地开展“公民教育”以外，香港年轻的一代很少接受政治教育，他们既缺乏一般的政治常识，也在父辈及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对政治漠不关心，更谈不上主动参与政治了。即使公民教育开展了相当一段时期，而其收效仍令人不容乐观。香港公民教育委员会于1987年委托雅捷市场研究社进行的《公民教育调查研究》表明，被调查的1,008位市民中仅有64%的人曾听过“公民教育”，他们大多数年纪较轻，教育水平和入息较高，而且在香港出生，但大部分被访者（占53%）都不知道公民教育的目的，仅有少数的被访者提及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了解香港的政治体制（10%），或了解公民权利和义务（8%），或履行市民的责任（8%）。该年在湾仔区进行的一项青少年调查中，当问及是否与人谈论香港政治方面问题时，515位被访者中的46.8%回答“绝对没有”，只有26.1%的人回答“间中议论”。足见香港青年对政治的关心程度。

然而，“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与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签订，把香港前途问题严肃地摆在了港人面前，引起了港人的震动。在政治冲击下，香港政治发展开始受到港人的重视和关注，国家民族意识显得尤为强烈，年青人中间开始出现了政治参与的趋向。香港学者指出，香港青年参政的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群体成份：

第一个组份是“论政团体”，一般由年轻的专业知识分子组成，其领袖年龄多在30岁至35岁之间，其成员受教育程度

高，表达能力强，注重分析，他们缺乏参政的经验，考虑“应该做什么”多而关心体制限制少；他们缺乏群众基础，很少接触基层的脉搏；他们较多地关心一些全港性、整体性的问题。

第二个组份是一群积极关注香港政治发展的知识分子。他们组织性弱，对体制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与分析，其政治立场较中立、持平、自主；他们与论政团体或当局并无紧密的关系，不算香港政治中心的“局内人”，但却能运用独有的资源与不同的组份（如两局、论政团体、基层等）保持联系；他们一般土生土长，在大专学校担任教职。

第三个组份较前两个组份更为年轻，年龄大多数在30岁以下，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关注社区建设，对社区事务有特殊的关注，在区议会选举中也有较佳的成绩。^②

但是，上述青年参政现象就整个青年群体而言，毕竟是极少数。就以1987年的议会选举看，21岁至25岁青年选民登记率仅达16.4%，尽管30岁以下青年人在区议会选举中参选的人数和获选为区议员的人数逐届增加，而大多数青年对政治参与并不热烈，青年的公民教育也未能发挥广泛的作用。

二、青年发展的文化氛围

香港既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又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无论在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方面，还是在家庭、教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等方面，都蒙上了东西方文化揉合的色彩，令人难以确切地用一个什么“模式”去加以描述。与香港经济、政治的变化发展一样，作为社会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的家庭、教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等，也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它与整个社会的

文化背景交织在一起，制约和影响青年社会化的发展，它所形成、造就的文化氛围，刺激着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念、心态、行为与生活方式的变化。

青年成长的家庭氛围

在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熏陶下，香港青年与家庭的维系很深。他们对父母和家庭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大部分青年认为父母家庭是温暖的和可靠的，对其思想和行为都有很大的影响。因而一般青年人对其父母的感情、信赖和评价，常常高于老师、朋友与大众传播媒介，其求学、择业、婚恋与生活也常常受父母期望的影响。很多青年把一个快乐的家庭看得比其它事物更为重要，高于金钱或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

然而，在商业化社会与香港人特有的金钱观的影响下，青年在其父母家庭中的地位以及与父母的关系，往往又与经济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般情况下，能够赚钱补助家庭支出的子女，更能取得父母的信任与尊重，赚钱越多其地位越重要，倘若到了“而立之年”仍不能给予家庭以经济补助，他们往往会受到长辈的轻视。这种关系的形成，往往给一些经济收入较微薄的在职青年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同时，这种关系的发展，亦会削弱青年人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由于香港两代人之间的生活经历以及所经历过的社会背景差异很大，当今青年与父辈之间也有一定的隔膜。他们的父辈，经历了五十年代困难与艰苦的时期、渡过了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与艰苦创业时期，而新一代却未经历过什么磨难，是在安乐繁荣与开放的环境中成长的一代，彼此之间的感受、期望以及价值取向等差别很大。两代人在对

“孝顺”的看法、对“性与婚姻”的态度、对“交友”的标准、对“享乐”的追求以至生活方式多方面的取向，都有可能大不相同，并由此产生隔膜与“代沟”。而这些隔膜的消除与“代沟”的填补，又有赖于家庭感情系统的强化以及有效的家庭沟通和家庭教育。然而，在香港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中，青年一代（尤其是在学青年）常常会面临家庭变化所带来的难题与困境。而最大的难题，就在于家庭沟通的困难与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最大的困境，则是由家庭破碎与解体所造成。

香港现代家庭变化的显著特点，就是家庭结构的改变。随着香港人口教育水平的提高、市民对生活质素越来越高的追求以及家庭计划观念的增强，传统中国社会理想家庭制度中那种数代同堂、子孙满堂的大家庭生活已日益分化，趋向小家庭或核心家庭；同时，工商业的发达为青年人提供了经济独立的机会，加上住房的狭窄与短缺，也促进了小家庭或核心家庭的盛行。一般青年大多认为应该组织自己的小家庭，并且不愿生育众多的子女，理想子女的数目通常是“一个好，两个妙”。据香港当局统计处的资料显示，香港住户的平均人口已从1971年的4.59人降至1986年的3.78人，而核心家庭在1986年中占全港家庭的74.6%。香港家庭变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妇女就业率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充分与家庭经济压力的增大，使许多妇女走出家门寻求工作，双职工家庭日益增多。

上述特点的出现，对香港家庭的情感系统冲击很大。核心家庭遇到问题时，只有夫妇间的支持，倘若夫妻间感情不和或因经济等因素出现矛盾与冲突，而社会又缺乏必要的辅

助与支持，其情感系统就显得十分脆弱；而夫妻双双就业，又常常因为工作路途远与劳累等原因而疏于家庭照顾、沟通与子女教育，其家庭沟通与家庭教育的功能弱化；这样，年青人在外界冲击影响下出现的种种问题与困扰，常常在家庭系统中得不到及时的沟通与指导，也难以得到家庭所给予的精神安慰与寄托。香港当局社会福利署的一项调查表明，被访者中对家庭持不满意态度的比例，由1982年的6%上升到1985年的7.7%，21.1%和2.8%的被访者对家庭沟通表示不满意或极不满意；还有15.2%的被访者表示与家庭成员相处困难；而被访的569位家长中的半数以上认为管教子女有困难。

离婚案增多、破碎家庭增多，是近年来香港家庭出现的严重问题。1984年至1985年间，离婚案件达4,500多宗；1986年法律援助署接获7,600多宗申请离婚的求助个案；到1987年，则有5,747对夫妇对簿公堂；从而造成破碎家庭青少年的成长困境。

由于家庭“解体”所出现的“单亲家庭”，使青年社会化的家庭环境受到破坏。“单亲”不仅因外出谋生而无暇亦无精力照顾家庭及子女的成长需要，而且因配偶的离去等原因，往往留下悲观或被羞辱等感觉，对万事抱着不良的人生态度，并由此影响自身以及整个家庭的气氛，使年轻人面对的困扰更大，时常因家庭沟通的困难与教育的单薄，而寻求朋辈的帮助与小团伙的庇护，其中意志薄弱者难免走上邪路。香港警方1986年警戒的4,745名青少年案犯中，30%来自有问题或破碎家庭。这种青年成长的家庭困境，日益引起社会和人们的关注。